

挺起时代的文学脊梁

——经典带给我们的启示

白 烨



从小说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来看,无论是改革开放以来40年,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映入人们眼帘的,首先是那些产生于不同时期的经典作品,如“十七年时期”的“三红一创”(《红岩》《红日》《红旗谱》和《创业史》)与“保青山林”(《保卫延安》《青春之歌》《山乡巨变》《林海雪原》),新时期以来的《古船》《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它们联袂而来,相映生辉,共同挺起时代的文学脊梁,耸立起小说创作的巍峨高峰,铸就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辉煌。

经典值得我们不断重读,也值得我们通过这些作品的营造与产生中寻索规律性因素,总结经验性启示,从而为新时代继续打造文学经典、构筑文学高峰,提供有益借鉴和有力动能。

深入生活的艺术结晶

反映生活是文学存在的理由,源自生活是文学产生的来由。作家们之所以能够写出经典作品,首要原因正在于长期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在此过程中,深入认识和把握生活动向,深切了解和体察民意所向,把自己所见所感经由文学想象化为艺术形象,使其成为人民生活的艺术结晶。

新中国成立后最先引人瞩目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保卫延安》,被评论家胡采誉为“人民英雄的赞诗”。这部作品正是作者杜鹏程长期跟随战火中的部队采访和生活的文学成果。杜鹏程1947年下到西北野战军的一个连队,经历前线部队转战陕北的浴血奋战,看到许多战士血肉疆场,保护他的警卫战士不幸牺牲。这些感人又撼人的亲历使他下定决心:“干,既然战士为了战争的胜利,一声不响地献出了生命,我们就应该把他们忘我的英雄精神记载下来,使自己使别人从这些不朽的战绩中,吸取前进的力量。”可以看出,《保卫延安》之于杜鹏程,是累积在胸的战争生活的必然涌流。

当代文学的不同时期,农村题材小说所以佳作连连,精品甚多,是因为我们有一批进城不离乡、心系农村的优秀作家。新中国成立后,已在北京工作的赵树理,从1951年起,每年抽出半年多时间回到晋东南家乡一带,深入农村生活,了解农村现状,这种与生活的紧密联系使他相继写出长篇小说《三里湾》、短篇小说《实干家潘永福》等堪称经典的作品。“山药蛋派”领军人物马烽,所以接连写出《韩梅梅》《三年早知道》等反映农村新人物与农家新生活的作品,也盖因他“骑自行车,带着行李卷儿,走到哪里住到哪里,饲养房、土窑洞、工棚、破庙都住过;农民不把他当作家、当外人看待,亲切地称他‘老马’。”他和“山药蛋派”作家们都是从人民生活里“泡”出来的。

写作基于生活的必要,生活对于创作的馈赠,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柳青扎根皇甫村创作出《创业史》。在皇甫村的十四年,柳青实现从立场到情感的全面转变。《创业史》是在写他人还是在写自己,是在写农民生计还是在写自我

如果考察最受欢迎的大众文艺题材,家庭伦理类毫无疑问名列其中。前不久引发观众热议的电视剧《都挺好》就是典型的家庭伦理剧,三个彼此有嫌隙的兄妹与一个不省心的老父亲之间生出一幕幕故事,让人窥见万家灯火背后的“几家欢乐几家愁”,也凭借故事蕴涵的原生家庭、孝道、男女平等社会热点话题引发观众思考。

回顾中国现当代文艺史,家庭作为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核心议题,一直都是文艺重要表现对象。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是个人故事和家庭生活日益凸显,一方面是电视作为一种“新”媒体开始走进千家万户,两相结合,让家庭伦理剧自此成为最受观众喜爱的影视剧类型之一。

以家庭伦理剧为代表,家庭伦理题材突出特征在于融合时代变迁与百姓故事,把社会历史嵌入世态人情的脉络里,将生活悲欢放到时代风云的幕布上。电视剧《渴望》就是通过以刘慧芳为代表的普通工人家庭与以王沪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干部家庭之间的情感纠葛,串联起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社会变迁。新世纪以来涌现的《金婚》《王贵与安娜》等,也是将小人物与大历史、小家与大家巧妙联系到一

核心阅读

经典作品创作在生活的深入开掘、艺术的充分准备、创作的不遗余力等方面表现出惊人相似,从中寻索规律,总结经验,将为打造新的文学经典、构筑文学高峰,提供有益借鉴和有力动能

命运,已经水乳交融得难解难分了——“作家深入生活的效果是用‘生活深入作家’的程度来反映的”,这是柳青发人深省的经验之谈。

高远追求的目标设定

创作一定有追求和目标,但追求有远近之分,目标有大小之别。与现在一些作家常常在写作中希求高产量乃至贪图高曝光度不同,优秀作家更在意作品质量与品位,更看重凭借精益求精的力作以少胜多,以一当十。写得少又写得好,主要在于目标高远,需要下一番苦功夫,投入巨大精力体力才能实现。那些写出经典作品的优秀作家,在这一点上惊人相似。

从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小说写作的梁斌,早就想写一部既是“历史的记录”又有“艺术的真实”的长篇,而且还设立了在当时来看几乎高不可攀的目标,那就是“具有民族气魄、民族化风格、一部地地道道的中国的书”。为了这个远大目标,他不断蓄积和提炼丰富素材,想尽办法去寻找阅读中外古今文学名著。新中国成立后,有了写作机会和可能,他便从武汉日报社社长岗位上,调回北京文学讲习所,之后又调到河北文联,并且一有机会就抓紧时间写作,还经常抽空约见老战友收集素材,到作品写到的地方实地踏访,终于用四年时间写出《红旗谱》第一部初稿。据梁斌回忆,写完之后,他长长出了一口气:“艰难的文学创造生活呀!”过程确乎艰难,因为目标实在高远。

路遥和陈忠实,两位作家都只写了一部长篇,但都留了下来,长销不衰,这既与他们郑重对待创作,注重精益求精有关,也与他们设定的目标超前高远,并为此孜孜以求、必欲达成有关。路遥自知写作《平凡的世界》,“是要在自己生活的平地上堆起理想的大山”。陈忠实则说,写作《白鹿原》,是想“为自己写一本垫棺作枕的书”。瞄着这个目标,陈忠实一方面翻阅县志,查阅村史,研读族谱,做着历史资料的充分准备,一方面大量阅读中外文学名著和理论著述,从中汲取有益文学营养,经过两年多积累与蓄势,用两年时间完成《白鹿原》的写作,又用两年时间细加打磨,终于如愿完成他的“作枕之作”。这些都告诉人们,高远目标的设定同时也意味着生活的深入开掘、艺术的充分准备、创作的不遗余力等高强度、大投入付出,这是创造经典作品所必需的。

家庭伦理题材屡成荧屏热点——

开掘现实 引领风气

张慧瑜

起,让家庭成为时代历史的一面镜子。近年来家庭伦理题材表现出来的又一鲜明特征是:积极向社会热点靠拢,回应普通百姓关切的问题,甚至主动进行议题设置。如《双面胶》《媳妇的美好时代》等表现婆媳关系,《老大的幸福》《下海》《中国式关系》处理时代变迁过程中的伦理困惑。通过教育、医疗、住房、伦理等热点问题做桥梁,进一步贴近观众生活,切中他们的心理和情感。

中国观众对家庭伦理题材有天然亲切感,因为家庭是中国人内心深处最看重的地方,“家和”才能“万事兴”。家庭不只是个人奋斗



路遥用大众眼光看待生活,以大众情趣抒写人生的追求表露得淋漓尽致。

充沛的现实主义精神

现实主义写作因细节真实性、形象典型性与描写方式客观性等特征,满足中国作家写作追求,贴合中国读者阅读需求,一直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占据突出地位,历练一茬又一茬实力派作家,催生一大批优秀小说。同时,不同作家又有不同继承与发展、不同侧重与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主义是开放的、发展的,作家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造访、自己的需要,去进行创新和发展。

个人与时代的有机结合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立足时代、认识时代、表现时代,既是一个作家应具有的常识性认识,也是一般人不易做到和做好的课题。经典作品的作家们,正是在这一重要问题上,以他们把自己融入时代的实践和创作成果,做出出色回答,给我们提供很好示范。

赵树理的小说,看上去多是家长里短,蕴含泥土气息,实则由婚姻与家事、乡俗与民情等日常事象,细致描绘社会变革给农民带来的心理悸动与精神变动,反映时代气息在普通农民身上的投射,表现农民在生活形态与精神状态上的与时俱进,因此被视为“十七年”农村生活历时性发展变化的文学缩影。

柳青对时代变迁引起的农村新变,极为敏感也极有兴趣。他不断“下放”自己,就是为了近距离观察社会主义农村形成过程,深入捕捉农民群众面对新生活的心理接受过程以及走向新生活的精神风貌。一部《创业史》,也确实写出时代脚步在蛤蟆滩激起的回响与涟漪,记录农民兄弟在新旧交替时代的进步与蜕变,从农村和农民角度为时代生活与精神描形立像,作了名副其实的时代“书记官”。

在文学中把个人与时代有机结合,路遥堪称范例。《平凡的世界》由改革开放催生的新人物、农村新变化,以及给农村青年一代带来的命运转机,歌吟改革开放对中国农村和中国社会的重大意义与深远影响。颇有意味的是,路遥作品中常常会有“我们”跳将出来,无论是叙事,还是抒情,抑或是议论,都有“我们”不断出现。“我们”不仅使作品叙事方式在第三人称里融进第一人称意味,使作者自然而然成为作品中人物中的一员,而且在不知不觉中把读者引入局内,使读者清楚意识到:“我”(作者)、“你们”(读者)和“他们”(作品中人物),都处于身历生活和思考人生的同一过程,是彼此勾连又相互影响的命运共同体。这里,既把路遥超越自我和为百姓代言的文学追求显露得清晰昭著,也把

助推器,更是避风港,是中国人的精神归属。因此,我们的家庭伦理题材作品大多表现的是团圆和谐的核心追求,这是中国人源远流长家文化的具体体现,也是此类作品感染观众、打动观众的地方。

与此同时,在中国文化中,家庭绝不是一个孤岛,相反,家事连着国事,国事连着天下事。在国家危亡时刻,千千万万中国人舍小家救大家;在和平建设时期,小家与大家共同发展。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深入与世界融合,这种以家庭为核心的价值观,也是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基础。在此意义上,家庭伦理题材文艺

艺海观澜

文艺创作如何强起来 5

文艺强起来的标志是高峰涌现,前提是文化基础牢固、保障体系健全,这就需要发挥地方和行业的文艺主管部门补短板、强弱项的保障作用

地方与行业的文艺主管部门在引领市场、塑造市场同时,应当与市场冷落处多发力、勤用力,与市场形成互补效应,推动文艺不断强起来。

一是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分配机制。在文艺领域,市场主导的分配机制有时并不能完全体现劳动者价值含量。以影视为例,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明星大腕高片酬占据影视投资绝对份额,剧本创作、后期制作等人员薪酬被一再压缩。音乐创作也是如此。一首流行歌曲火起来,最大受益者往往是歌曲演唱者,词作者、曲作者获益很少。演员和歌手的演绎固然关键,其他环节并非无足轻重:一部影视剧,剧本是一剧之本;一首歌曲,词曲本身是成功与否的关键。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分配机制,除了对薪酬进行合理限制,更重要的是加大版权法执法力度,让创作者通过版权收入获得应有收益,激发创作热情。

二是构建立足长远的专业人才队伍。文艺繁荣发展,很重要的因素在于建立健康良性生态系统。近年来,随着市场意识加强,一些影视机构、文艺院团愿意在人员配置上向台前演职人员倾斜,这固然重要,但原有的编剧和研究人员的再压缩,有的甚至取消,显然也不利于文艺创作。事实上,这些隐匿在市场背后的力量,虽然很难直接在市场上赚取真金白银,但对于文艺长远发展意义重大。再比如,文联、作协系统里活跃着一大批文艺评论工作者,他们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这就需要地方与行业的文艺主管部门加以宏观调控,让人员设置更加有利于文艺长远发展和文艺生态建设。

三是搭建多元推介展示平台。应该说,当下为文艺发展搭建的各类平台已经非常丰富,目前主要矛盾是平台不均衡、机会不均等。以电影为例,商业电影可以凭借雄厚资本优势,抢占包括院线在内的各种紧缺资源,从而获得更多展示机会。为数量多的小成本电影就没有这么幸运。很多小成本电影艺术水准也很高、现实性也很强,但与商业电影同台竞争、争夺院线,偶尔一两部胜出,改变了大多数小成本电影不声不响、陷入沉寂的命运。戏曲也存在同样问题。一些小剧种因为市场开拓能力不足,很难获得足够展示平台。地方与行业的文艺主管部门在搭建平台过程中,应该在多元化上做文章、下功夫,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交给市场,同时把机会、平台更多分享给被市场冷落的艺术门类、艺术群体,推动形成多元共进、美美与共的蓬勃局面。

四是设计更多重心下移的文艺项目。目前,在项目推进方面,瞩目高端、立足精品者居多,能够惠及基层尤其是专注基层文艺发展的好项目还比较匮乏。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广大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强烈。地方与行业的文艺主管部门要在广大农村地区以及偏远山区培养文艺队伍,打造活跃在田间地头的“文艺轻骑兵”。目前广大农村地区普遍拥有一大批文艺骨干和文艺爱好者。他们是基层文艺生力军、是文艺火种的传播者。他们的作品接地气、有泥土味儿,往往深受百姓欢迎。以项目形式对这些基层文艺人才进行扶持、培训,提升其专业水准和艺术品位,是目前较为迫切的任务。这不仅满足基层群众精神文化新期待的有效方式,更是夯实文艺基础、推动文艺向更高峰攀升的必要手段。

文艺强起来的标志是高峰涌现,其前提是文化基础牢固、保障体系健全。这就需要一方面发挥文化市场积极作用,一方面发挥地方与行业的文艺主管部门作用,补短板、强弱项。把更多资源向短板项和薄弱处倾斜,正是培根固本、夯实根基的有效手段,将更好推动文艺由“高原”迈向“高峰”。

打通经脉 筑牢根基

杨利景

